

---

## 關於研究工作的幾個思考\*

張文強\*\*

---

### 摘要

跟隨台灣學術場域愈來愈嚴重的資本化，管理主義與形式主義成為兩股重要力量，交錯影響研究者與研究工作的進行。本文主張，倘若我們認為學術工作需要保有自由、多元、批判本質，那麼適時針對研究工作做出後設思考是重要的事，即便這些後設思考無法撼動結構，卻至少象徵一種掙脫結構的自由意志。因此，本文嘗試以「我的研究」這種說法，做為避免研究工作被形式化的提議。而研究者與其產出成果可被視為作者與作品間的關係，作者具有藝匠精神，透過反覆細工成就出最後的作品，藉此避免研究者與其研究成果發生異化情形。

關鍵字：研究方法、形式主義、管理主義、學術資本主義、藝匠

---

\* 這篇文章的開端來自過去八年多擔任《傳播文化》主編的反思，但隨著書寫計劃逐漸偏離原先主題，幾經考慮書寫目的與寫作方式，最後選擇讓它成為一篇描述我對研究工作看法的研究書寫，或許，它適合被視為關於學術研究的文化觀察文章。

這篇文章是主觀的，有些論點可能更是大膽，另外，因過去學術寫作習慣，以及本文發表在學術期刊上，雖然不斷拿捏，我還是無法掌握較好的寫作腔調，這點請您諒解。而之所以提出這些觀察的目的是想促成行動者的後設反思，而非成為一個檢核表，而且它也並非指涉場域內的所有行動者皆是如此，或具有所有論點指涉的問題。

總之，希望這段說明能幫忙您瞭解這篇文章屬性，也希望它不會因此成為一篇四不像的文章。

\*\* 張文強為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教授。聯絡方式：049214@mail.fju.edu.tw

假設一：我們<sup>1</sup>應該自覺於結構與行動者間的社會學式關係。學術場域（或更為廣義的大學教育場域）的結構總是規範著研究是什麼？研究可以怎麼做？研究者該扮演什麼角色這些問題。

假設二：這些問題可能是庸人自擾，因為研究似乎不難做出來。不過，偶爾進行回顧與回應應該也是健康的，因為這些問題或許有助我們察覺自己工作是否、或正如何被結構化著，然後帶來關於研究工作的新感知、新的研究風格，並回饋於實作。

假設三：的確，結構力量可能極為強大，讓人難以掙脫，針對這些問題所做出的後設反思，可能無法幫忙我們在結構中取得足夠的自主與主體性，然而這裡還是想要主張，即便是微小、無法撼動龐大結構的游擊戰，後設反思象徵一種企圖掙脫結構的自由意志，或者藉此可以進一步在主流中尋求不一樣的可能性。

## 壹、資本主義下的頂尖與生存問題

社會學經常研究其他場域的結構問題，不過要學術場域直面自己的結構，可能得有著在眾人間喊出國王沒穿衣服的天真勇氣。而這或許也正是 Bourdieu 爬梳大量資料寫成《學術人》(Bourdieu, 1984/李沅洳譯, 2019) 珍貴的地方。

在台灣，社會人文學者很少單純從事研究工作，需要受雇於大學體系的事實，意味著有關研究工作的分析得置放在更為廣大的教育場域才能貼近現狀，而這些年大學體系的結構性變化，讓研究可以怎麼做等後設問題的反思顯得更為重要。

整體來說，隨著大學場域從公共財制度轉變到新自由主義模式，所謂的學術資本主義（林宗弘，2015）成為關鍵因素，大學徹底產業化、市場化，改變了教育、老師、師生關係的定義。當然，這不是學術場域獨有的轉變，在整個社會不太質疑、甚至信仰資本主義的脈絡中，這種經濟世界

---

<sup>1</sup> 這三個假設是本文基本立場，書寫在最前面是想透過直接揭露，讓您選擇閱讀、詮釋本文的方式。而這裡使用「我們」則屬於希望邀請大家進入三個命題的書寫修辭策略，當然，您可以選擇其它閱讀位置或詮釋方式。

邏輯向生活世界殖民的狀態<sup>2</sup>，順理成章地被論述成一種自然轉變，「競爭力」、「頂尖」、「世界一流」所發揮的巧妙語藝效果更是反覆鞏固其合法性。我們被定置在一條以客觀、效率為名，各式評鑑、數字管理為實際管理策略的軌道上，假設會因此取得更好的教學、研究績效，然後頂尖、卓越。

從公共財制度到新自由主義制度是一種選擇，然而無論有多少大學可以因此頂尖、卓越起來，這項選擇的另一面，從各式評鑑、到各種招生手段、再到退場機制，卻反諷地指向一種大學的生存問題<sup>3</sup>。生存問題同時屬於校方與大學雇用的行動者，而在這裡，關心的是後者，特別是所謂的研究者。

換個說法，從公共財制度到新自由主義是哲學層次的轉換，更是透過諸如教師評鑑等各種管理制度架構出的學術場域結構轉換。在重新結構化後的學術場域，頂尖是一回事，稀有、也的確可以追求，但對大多數研究者來說，更為寫實的是該如何通過評鑑、順利升等，或發表更多研究論文為自己取得更好資源。生存或創造更好資源成為實際問題，也因此，在新結構中，研究者還是在從事名為研究的工作，不過研究、怎麼做研究、研究者的角色都可能出現重大變化，而這也將問題帶回到本文最初三個命題。

在接續討論前，這裡簡單離題並做出以下主張：當下學術場域看似自由，依然各做各的，甚至更有效率、資源更多，但被資本主義邏輯殖民，重新結構化後的學術場域似乎日益失去以往左派的警覺，以及做為文人、知識分子的可能性，而且在教學、研究層面均是如此。但大學、研究者該如此嗎？除了主流，還有沒有其他看待研究、做研究的可能性？

<sup>2</sup> 這裡簡單粗暴借用了 Habermas 生活世界被系統殖民的概念。這種借用是想要說明大學教育場域原有的各式邏輯，例如歐陸知識分子的左派精神、傳統華人社會的傳道、授業、解惑，已被管理主義與消費者關係所取代。大學成為一般產業，失去原有或其他邏輯的可能性。

另外，配合緊接的描述，這裡也想凸顯資本主義促成學術場域內左派、反資本主義立場的邊緣化。我並非主張大學、研究者都需要進入左派位置，激進、戰鬥，但這裡願意承擔被貼上老派、左派標籤的風險，的確想要藉由左派式警覺，提醒台灣學術場域不自覺被資本主義邏輯殖民的結果。在過去，特別在歐洲，即便現實世界多麼資本化，大學與知識分子的左派傳統至少象徵著資本主義以外另一種多元、自由、對抗的想像，然而現今資本主義全力殖民的結果像是驅逐、至少邊緣化了左派反對的可能性（當然，也包含傳統文人、藝術家、哲學家、知識分子立場的可能性），然後在原本應該自由、多元的學術場域，資本主義不自覺地成為一種新威權、集權，主導了行動者的邏輯與意志。大學與研究者的多元、自由、浪漫精神似乎也愈來愈不可能。

<sup>3</sup> 戴伯芬等人已系統性地分析了這些問題，可參考戴伯芬、林宗弘等著（2015）與戴伯芬（2021）。

## 貳、學術場域結構與研究工作的連動

這篇文章集中討論學術場域的研究層面，管理主義與形式主義的交互影響是理解結構與結構化的主軸。

### 一、管理主義

上段有關當下學術場域轉向效率、競爭、管理技術手段，說明了管理主義的盛行與影響，大學不再屬於知識分子、文人，甚或專業主義邏輯的場域。管理主義做為主流，難以否認具有長處，但也帶來不少問題。例如，教學評鑑是管理主義的具體展現，以往信任教師、由教師主導的教學工作開始可以被評比、競爭，然後隨著時間不斷進行的再結構化，最終成為管理老師的手段，而評鑑分數高低反映的是教學真的績優，或是比較會討好學生這類問題則愈來愈不被認為是個問題，好像只能默默接受這種機制。

研究工作也有類似狀況，配合具有親近性的泰勒主義、福特主義哲學引導，管理主義將研究工作同樣放入生產、效率邏輯之中，採用了許多標準化機制、量化指標進行衡量，然後再因為這些指標緊扣著升等、教師評鑑，對大學研究工作者來說，做研究的意義似乎也出現改變，做為志業、社會解放與實踐等傳統成分降低，慢慢轉成為生存或為自己取得更好資源的問題。

當然，不同人的在意程度、面對方式不同，但因應管理主義興起，這裡很難迴避一組刺耳的問題：研究工作是否成為拚績效的生產工作？在生產線上，我們是否成為學術勞工？學術勞工生產的是產品，或是作品？如果我們同意馬克思主義的觀察，從傳統藝匠到生產線上勞工，工作意義會出現改變，且有著異化麻煩，那麼，這組刺耳問題的答案似乎不難想像。而在或可稱為勞工宿命的脈絡下，關鍵也許在於研究者是否想要回應、反抗或找尋其他可能性，或是順著管理主義就是忙碌做著研究，沒有太多時間思考研究是什麼？研究要怎麼做？研究者角色這組問題。

### 二、形式主義

鍾蔚文（2002）二十多年前便討論過形式主義的問題。他從學門發展

角度切入，認為學門成熟後，從問題選擇、研究取徑，到書寫方式都會進入慣性思考，遵循常規進行研究工作，對應著形式主義脈絡。例如不管研究題目為何，只用固定理論與角度切入，以致結論也出現一定方向；做研究時，先想到的是方法，甚至更為極端，研究開始如同技術操作。

二十多年後，形式主義依舊存在，而且學術場域結構轉變讓問題變得更加嚴峻，這裡做出兩項延伸觀察。第一，研究的形式主義可以被解釋成一種做研究的主流或「標準」作法，在強調研究發表績效的學術場域，依循主流進行研究似乎可以讓研究者取得更多心安：論文審查與發表過程可能因此更順暢，不需要因為採用非主流方式而需多做解釋，並冒上風險。學術場域結構幫忙研究的形式主義更有底氣，而代價似乎是研究者進行另類、非主流探索的勇氣。

第二，如果允許再大膽點做出論述，經驗研究，特別是量化經驗研究似乎仍是形式主義的一項關鍵。本質上，經驗研究認為研究者要用客觀方式發現外在那裡的真實（Blaikie, 1993; Slife & Williams, 1996）。這種方法論立場對應著提出問題、進行文獻檢閱，再到利用經驗資料確證或否證的研究邏輯，然後自然且合理地形成現今第一章到第五章的主流研究與論文書寫方式。另外，為求取最有效度的方式做研究，研究方法技術受經驗研究極大重視，本身就成為一種獨立的研究領域。這反映在經驗研究方法教科書如同技術指南或操作手冊之上，細工於抽樣方式、各種量化方法的標準化。

如果說方法論邏輯促成經驗研究的固定研究形式，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形式似乎也被具有不同方法論邏輯，所謂的質化研究<sup>4</sup>挪用。從質化研究也開始採用第一章到第五章的書寫邏輯，質化研究方法也出現操作手冊化的傾向，我們不難看出質化研究像是向經驗研究的形式靠攏，造成台灣研究場域的形式主義更為嚴峻。簡單一提，如果質化與量化被對比成兩個陣營，質化研究不自覺挪用量化形式是一種學習的結果，也像是對質化研究的反諷。認為現象是被建構；需要於研究問題、理論與經驗證據間反覆辯證，程度不一接納主觀成分；強調每項研究具有獨特性，保留書寫邏輯與形式彈性的質化研究<sup>5</sup>，因為形式主義化的關係，不自覺地讓出方法論與認識論的堅持，成為經驗研究的分支。

### 三、一個大膽的觀察：研究工作的「私人」化傾向

管理主義與形式主義以複雜方式構成台灣當下學術場域的結構變化，並且配合各種實際作為不自覺地框限住行動者，當然，行動者不自覺地依循也回頭促成再結構化。而這也是本文主張需要進行後設反思的原因，藉此檢視我們是否正被結構化、看到主流以外的可能性。不過進一步就此論述前，這裡還想大膽提出另一個觀察：研究工作的「私人」化傾向<sup>6</sup>。

雖然可能沒有明說，至少在過去，知識、研究、學術工作這組概念包

---

<sup>4</sup> 這裡加上「所謂的」是想避免進入質化與量化的形式主義區分。我理解量化與質化是當下區分研究的主流方式，這種區分有其意義，透過比對可以更為清楚理解兩個陣營的認識論、方法論，然後回頭反思自己研究慣性。另外，某些研究也明確適合使用統計方式進行。

不過這裡也想借用 Feyerabend (1975/周昌忠譯, 1996) 的科學無政府主義狀態：科學研究不存在固定、普遍的規則，唯一的規則是不規則，怎麼都行。我想借用這種帶有後現代意味的說法表明，從認識論、方法論進行論證，質化與量化可以視為具有本質上的差異，但倘若只是基於分類理由做出區分，極可能促成的是研究與研究者被迫選邊站，然後質化與量化成為一種研究的意識形態劃分，形式主義的關鍵。因此，也許可以嘗試另一種觀點：應該是由我們要解決的研究問題來決定採用哪種（些）方法，而非因為研究方法而決定要做什麼研究，不做什麼研究。甚至於說，許多研究問題本身並沒有量化與質化的既定本質，研究者應該先致力於找到有意義的好題目，再依照題目選擇、混搭，甚至發明適合解題的方法。過度以研究方法，特別是是否運用統計做為劃分標準，很可能產生一種方法決定論，即，要做什麼研究不是建基於此問題是否值得做、是否具有意義，而是由方法決定要不要做什麼題目。或者不管適不適合，就用自己慣用方法解決手邊研究問題。這種研究方法的反客為主也正是落入形式主義的關鍵。

<sup>5</sup> 討論質化研究各式議題的書籍不少，而 Denzin 與 Lincoln (2023) 的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是可參考的書籍，此為第六版。

<sup>6</sup> 研究工作從公到私這個概念，起源於與輔大社會系魯貴顯老師的對話，是魯老師運用公與私概念化了我們討論內容。特別感謝魯貴顯老師。但這裡如果發生論述上的缺陷是我的問題。

含著一種公開、向公眾開放、服務公共的寓意。聚焦於研究之上，無論是落入俗套地主張研究應該為了社會福祉，更臻完美，或是批判社會學強調的解放、實踐、改變社會結構，這裡冒著化約的風險，研究，像是具有「公」的成分。即便是基於單純求知熱情進行研究，研究也不太被視為私藏於自身的工作。就研究工作來說，這解釋、也預設了研討會與期刊的意義：公開發表研究結果、公開對話的機制。而順著此脈絡進入更為廣義的大學場域，教室應該是公開傳授或思辨知識的基本所在，大學校園應該公開舉辦各式學術演講，再者，老師們自組的研究群，在某個校園角落自發地學術對話，更被視為美麗的學術景致。理論上，大學應該被視為公開或公共場域，研究者應該具有公共知識份子，或至少得重視公共的成分，而不單是獨善其身的個體。這種理想一定程度上被落實，也因為這理想，學術自由像是社會給予研究與學術工作的權力，藉此可以自主思辨、研究、批判與論述。

時代會轉換，同樣先以研究工作來看，研究是否還是要「公」，或要多少比例當然可以改變。這具體發生在管理主義與形式主義主導的大學場域內，一旦研究工作的功能不自覺轉向促成個人升等、通過評鑑，可能出現的狀況是，設法讓文章被發表、發表數量，勝過於要發表什麼、對社會有什麼意義。配合形式主義的討論，研究社群似乎出現一種需要留意的轉變：期刊、研討會是否成為單純的論文發表機制。例如論文審查不再是作者與審查者的公開對話或理性辯論，因為需要發表點數，所以可能發生的狀況是在各次複審過程中，作者客氣地回應審查意見，做出策略性修改，至於是否真的同意審查意見不再重要。也就是說，倘若上述觀察有一定真實度，為了順利刊登、取得點數，似乎犧牲了學術社群公開對話辯論的精神。默默間，研究之於研究者的私人意義成為做研究的關鍵，出現私人化傾向的徵兆。

配合學術場域內更多管理作為來看，這種徵兆變得更為具體、明顯。例如各種研究獎勵、重視產學合作、鼓勵研究者創業創新，在在將研究工作導向個人績效，出現更為明顯的私人化傾向，一種私人事業的脈絡。另外再加上一旦學術場域本身也出現形式主義的情形，例如，期刊必須爭取

認證，成為一級期刊；舉辦研討會是系所單位 KPI 的一部分，如此一來，缺乏實質對話、公共本質的學術場域不但無法做到眾聲喧嘩、質然問辯，在這種結構中，將更為落實研究工作成為私人事務、事業的傾向。

Mills (1959/張君玖、劉鈞佑譯, 1996) 1950 年代主張特別是經驗研究具有服務官僚體系的意義，例如軍隊、企業，以致研究應有的自主性消失，而順著 Mills 的觀察，這裡想得寸進尺地提出一個更危言聳聽、誇張的說法，在資本主義殖民學術場域的結構中，除了因為服務官僚體系而失去研究原有的自由精神，我們可能需要思考研究是否愈來愈像是老師必要去做的工作，服務的是我們自己。然後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研究失去可以具有的自由與靈魂。

當然，上述說法沒有充分證據，也危言聳聽，或者說，公共成分消退是當代社會的普遍選擇，公與私人化傾向也並非不能共存，只是這裡還是想要囉嗦提出研究工作私人化傾向可能帶來的風險。再當然，私人化傾向是更為根本的大學場域問題。諸如過去普遍存在於校園中的學術演講被求職等實用類型活動取代，教室內的消費者關係取代傳道、授業、解惑的關係等轉變，也在說明不只是研究工作，知識與學術似乎不再是大學系統內的核心。「大學產業」的說法指向大學本身馴服於資本主義邏輯，其中行動者所從事的研究、教學似乎亦是如此。最後，在這樣的脈絡中，如果我們認為研究工作應該是自由的，不應該服務官僚與學術系統本身；如果我們認為研究者還是應該在嚴苛結構中爭取某些能動性，也許接下來的問題便是研究者可以怎麼做。

### 參、回應結構的第一步：關於研究工作的後設思考

先提醒兩個小前提。首先，我們不能排除結構力量已大到讓人窒息，缺乏行動的可能性，但儘管如此，這裡還是想保留一些希望。第二，用來回應強大結構的方式或策略具有游擊戰與強烈的個人性格，例如在不同學術位置應該有不同策略。也就是說，研究者應該還是可以回應結構，而回應的方式應該是複數，由個人審視自身與結構狀態後所決定的。

在這兩個小前提下，接下來論述是我個人對「研究可以怎麼做」的後

設思考，這些後設思考可被視為回應結構的第一步，藉此陳述主流之外應該還是有著其他可能性。而「我」是關鍵<sup>7</sup>。

呼應鍾蔚文（2002）認為形式主義對應或促成「無我」的研究，不鼓勵發揚個人風格、想像，甚至以客觀之名將個人的涉入汙名化。這裡主張特別是在管理主義促成的異化風險下，研究者可以嘗試擺脫主流或形式主義的桎梏，在沈思「我」與結構的關係後，找到屬於「我的研究」。基於論述策略，接下來將適度運用作家做為比喻，增加想像可能性。另外，基於研究問題發想是「我的研究」的最初關鍵，因此接下來將進行較多篇幅的討論，之後，再討論研究方法的執行，以及如何書寫的反思。

### 一、什麼可以成為研究問題

對有經驗的研究者來說，找尋研究問題似乎不是個問題。在形式主義脈絡中，搞定研究方法被認為比確定研究問題來的關鍵，或者說，可能出現一種從自己擅長理論中找題目的慣性<sup>8</sup>。

<sup>7</sup> 強調「我」，並不意味主張與客觀對立，認為研究是全然主觀、沒有章法、不強調方法的。我認同客觀是經驗研究的基礎，或者說，即便對於非經驗研究，客觀也有提醒研究者適時抽離研究現象的重要意義，以利用不同角度建構理論的可能性，不過我們也的確需要留意並非依照標準化方法做研究就會客觀，很多時候，它反而與形式主義有關，最終導致研究者主體的消失。因此，「我」的運用是想強調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的位置，而非因形式主義反過來被理論、方法主導。使用作家做為比喻也並不表示研究者就等同於作家，而是想要表達一種「我」的脈絡，與作家一樣，研究者應該有著對於社會現象的細膩觀察、分析，也可以有著想像，最後成就自己的作品。

另外需要一提，經驗研究亦被認為具有由研究者主導（例如用研究者角度設計問卷、實驗方式），忽略被研究者聲音的特徵或缺點。這種說法看似與缺乏「我」的說法相矛盾，對此有兩項說明，其一如前所述，雖然經驗研究具有以研究者為主體、被研究者為客體的特徵，但形式化後，研究者其實被形式取代了，研究不再有「我」。其二，本文後續將提出我個人對於研究邏輯的觀點，強調不必避諱「我」在理論建構過程的位置，但「我」是需要被平衡的，需要透過經驗資料的收集、分析充分帶入被研究者的聲音。

<sup>8</sup> 除了前述的方法決定論，理論與研究問題間也有兩項值得注意的慣性。首先，如正文所提，是一種研究者從自己擅長理論找尋接下來研究題目的作法或慣性，而這裡的理論可以是實證理論，也可以是政治經濟學、女性主義等理論。其次，是發想研究問題時，經常有著要找一個理論做為整體架構的慣性。兩種慣性的確成就不少好研究，更有助於既有理論的深化，不過在形式主義風險下，還是想要提醒兩種慣性有著讓理論反客為主的風險。前者可能限定了研究者觀察、發想問題的「我」的視野，後者則可能因為急於將初步成形的研究問題放入一個理論架構，而失去更多思考角度的機會。如果打破慣性，例如 Mills（1959／張君玖、劉鈞佑譯，1996）提到的社會學想像便意味著另種尋找研究問題的方式。從自己興趣、煩惱形成問題，再尋找相關文獻精緻化接下來的思考，讓研究問題先行於理論，也許是不被既有理論綁住，發展屬於「我的研究」的方式。簡單來說，我主張，直接觀察自己的研究問題、研究問題先行於理論是關鍵，即便之後依然與慣用理論有關，也可以成就好的「我的研究」。

### （一）從生活中觀察到「我的研究」問題

基本上，這種找尋研究題目的方式並沒有問題，只是如果我們願意嘗試脫離慣性，或許會發現如何找到好研究問題不單是研究的開端步驟，更是成就「我的研究」的關鍵，而它應該有其他可能性。Mills（1959／張君玖、劉鈞佑譯，1996）的社會學想像是一個出發點，研究者應該從個人煩惱與公共議題間的扣連尋找研究問題。

或許正因為形式主義導致「無我」式研究（鍾蔚文，2002），這裡需要提醒一種研究者向書本、理論尋求研究問題，忽略從生活中尋找自己感動題目的慣性。然而要從生活中找題目，關鍵在於研究法教科書不太討論的觀察力，簡白地說，研究者如同好作家一般，需要敏銳的觀察力。黃春明（1974）的短篇小說不只是書寫小人物的辛苦生活，更是對於農業台灣到工業台灣的細緻觀察，沒有細緻觀察很難出現《看海的日子》、《蘋果的滋味》。相對地，夏曉鶯（2002）在《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對於外籍配偶的描述，也是類比她自己經驗，細緻觀察到外籍配偶在台灣生活困境，然後發展出來的邏輯論述。我們可以說，黃春明與夏曉鶯都有著社會關懷，也分別用作家與研究者身分說明社會觀察的意義。

一位已在連鎖餐廳內久等的老人，對上一位不太耐煩的服務人員，是老人不會使用點餐軟體？還是不願意使用？是老人想要保有與人互動的感覺？還是頑固地不肯學習新事物？這種可能看來只是個人的煩惱，事實上連結著重要的社會構面。它是否意味世代間的數位落差？要如何解決這些落差？在科技代表「進步」的社會，它是否代表著對於被認為缺乏數位能力老人的歧視？也就是說，在先不講理論的狀況下，老人與服務人員間其實隱藏著不少研究題目，作家可以就自己觀察細膩地寫成一篇短篇，研究者可能透過觀察找到屬於自己的題目。想再一次說明，如此做，並不在否定從慣用理論找題目的合法性，也相信已有相關研究正在進行，這裡想表達的是，我們可以先決定要做老人研究、數位落差研究再找題目，但從生活經驗、個人煩惱中也可以找到不錯、屬於自己的題目，然後再透過閱讀文獻等過程寫出好論文。這種找題目方式可能缺乏慣用理論帶來的安全感，需要花費不少時間閱讀其他領域陌生文獻，但，這是「我的研究」。「我的

研究」是避免形式主義、研究者與研究工作異化的關鍵。

## （二）看到技術旨趣以外的研究問題

在「我的研究」基礎上，請允許接下來兩項同樣缺乏十足資料所做的觀察。

首先，傳播研究題目的發想經常與實務工作流行有關，至少部分有關。這種找題目慣性對應著傳播研究的應用學科本質，有其合法性，為學術研討會、期刊接受，而且在強調實用、以產業需求為核心的當代大學環境中，它愈加具有展示研究工作沒有與實務脫節的潛在意義。不過得簡單一提，這裡應該將承接企業、公部門的行政研究計劃區分出來，行政研究有其獨特性。另外，在大學做為產業的學術資本主義中，諸如產學合作、透過研究結果進行創業，會為研究工作帶來哪些改變與風險是值得注意的事情。

無論如何，儘管這種找題目慣性有其結構因素，但至少從社會學角度，並延伸 Habermas (1971) 的說法，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是這種慣性是否會在不自覺間排除掉屬於批判取向、解放旨趣的研究問題。基本上，受實務啟發進行研究沒有問題，也可能做出「我的研究」，不過在經驗主義傳統依舊主流、甚至形式化影響其他取徑研究的情境中，似乎存在一種可能性：傳播研究與實務工作的親近性容易將研究問題導向經驗研究的技術旨趣脈絡，更誇張點說，習慣經驗主義的頭腦將很自然地看到技術旨趣的問題。因此，傳播研究者可能集體關切人工智慧，於新聞、廣告公關、影像等領域做了許多研究想要了解如何運用人工智慧、相關運用細節，以及預測可能的未來，卻似乎不太關心人工智慧的學術反思與批判，例如它創造了怎樣的知識論，這種知識論又如何成就一種用科技中心主義看社會的傾向，事實的定義、說服敘事的策略、影像的美學如何被改變。

這裡並非主張帶有批判精神的研究才是好的「我的研究」，而是想要提出在研究主題多樣的眾聲喧嘩中，批判脈絡的傳播研究是否愈加不被重視。當然，不被重視是相對的主觀感受，也可能是因為批判取徑於當下不再流行，未來不排除翻轉的可能，而且批判也不應該只有政治經濟學式的傳統定義。不過無論如何，如果我們認同 Bauman (2000) 認為社會學家應該穿

透一道顯而易見、由主流意識形態築起的牆，去揭露某種被隱藏的事物、被隱藏的人類可能性，我們似乎便有必要留心傳播研究與實務工作的親近性不利於這種研究精神，研究者可能就是關注眼前現象，而非試圖去揭露背後隱藏的事物。

專注研究眼前現象經常對應著一種默認，至少是擱置對現象存在合法性的相關質疑，當研究者熱切從人工智慧找尋「有用」的研究問題時，應該很難於同時間去批判他所研究的人工智慧。在經驗主義傳統仍為主流，形式主義與管理主義勾勒台灣學術場域結構的狀況下，我們似乎可以合理推論與應該留心：傳播研究與實務工作的親密性促成的往往是技術旨趣研究，較少是去洞察或批判意識形態所掩蓋的事實，藉此取得啟蒙可能性，幫人們洞察自己生活中的真實矛盾與困境。

也就是說，在當下，持續進行的批判研究維繫了批判精神，值得尊敬。不過或許更積極的是，在技術旨趣、有效解決實務問題脈絡中，也許更多研究者可以帶著洞察結構的可能性，透過深刻觀察看到某些具批判屬性、「我」關注的研究題目。無論是嚴厲或溫和，洞察與批判應該是不可逃避的工作，應該保留給批判式研究問題一個位置。

### （三）看到時間跨幅的重要性

另一個有關研究題目的觀察是，需要長時間跨幅進行的研究題目似乎不多，三項原因或可解釋這種狀況。

第一，或許最主要，也不難理解的是研究者容易看到自身所處時空發生的研究問題，這點同時適用於量化或質化，經驗或非經驗研究題目的發想上。第二，與經驗研究方法有關。經驗研究主要是在處理特定時間內一組變項的關係，例如涵化理論在確認看電視愈多是否愈容易認知社會充滿更多暴力可能性。配合前項原因，經驗研究邏輯更加強化了研究的斷代特徵，即，研究當下時空的現象。例如，就在幾年前，研究者不難觀察到資料新聞學的橫空出世，然後在快速期間內累積大量相關研究，但相對地，傳統記者重視人脈經營的工作方式如何慢慢轉換成當下液態式工作樣態；傳統以公共為核心的獨家新聞定義如何慢慢演變成只要別家沒有就是「獨

家」的獨家新聞，這類或可比喻成溫水煮青蛙、可能經歷十數年的慢慢轉變，若非借助時間跨幅幫助，很難在單一時間點被注意到，也很難被妥善處理。簡單一提，路徑分析、時間序列等高等統計學包含時間概念，不過主要落在變項關係預測或趨勢預測之上。第三，對應台灣當下學術場域績效評估方式，期刊論文成為研究發表的主要管道，而其字數限制也不利於經常需要長篇幅論述的時間跨幅研究，當然，同樣理由亦限制住其他需要大篇幅才能處理的複雜研究問題。

有些好問題就是需要透過長時間跨幅才能觀察到，也才能進行長篇幅細緻分析。例如 Foucault (1979) 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透過系譜學詳細論述了權力問題，Said (1979/王志弘等譯，2000) 也同樣用書的規模論述《東方主義》的歷史脈絡，再或者若非 Bauman (2000) 長期關注現代性發展，應該很難觀察到，然後寫出《液態現代性》。也就是說，如果時間流動是人類社會本質，很多現象或問題發生在漫長時間流動中，研究者除了關注眼前現象，也應該敏感於某些跟隨時間演變所造成的問題。事實上，系譜學、思想史的研究便在處理這些問題，前述 Foucault 與 Said 的研究是很好的例子，也成就屬於他們自己的研究。

只是從這裡回到台灣當下學術場域結構，我們不得不留意一種狀況，當關鍵績效指標國科會研究計畫案多半以「年」為執行週期，而研究結果又以期刊形式發表，具有數量累積的優勢，在管理主義脈絡下，這便也意味著需要時間跨幅的研究不是主流，更不符合性價比：時間漫長，發表量少。當然，這個問題並非不能克服，研究者可以透過好多年、數個研究累積，或者敢於不受限國科會研究支持，用自費方式長期聚焦自己關注的研究問題，只是這裡又會回到結構帶來的生存問題。研究者要有很大勇氣擺脫結構，才可能去做長時間跨幅這類性價比較低的研究，而這是一種結構中如何堅持「我的研究」的勇氣與意志。

最後，與時間有關、另一個簡單卻有深意的問題是，近年來思想史，或單純歷史取徑的傳播研究似乎也不常見。再一次地，如果人類社會是發生在慢慢時間軌跡之中，也許我們需要更多的傳播思想史研究，需要傳播歷史研究的回歸。當研究者探討新聞自由在日據時代、戒嚴時期的發展；

知道報禁等關鍵歷史事件如何發生，又如何能在權力脈絡中折衝，這些將不只是歷史個案研究而已，而是有助於我們透過類似問題的歷史對話，在時間脈絡中理解、分析當下新聞工作是否脫離權力掌控，或者如何換個形式被掌控，當下掌控策略又是隨時間發生怎樣的變化、如何變化。至少，傳播歷史的研究紀錄了過去樣態，未來不至於成為缺乏歷史與時間縱深的社會。

## 二、做研究的邏輯與書寫邏輯

除了研究問題的發想，學術場域結構也分別影響到做研究邏輯與書寫邏輯的慣性，「我的研究」亦與這兩部分有關。

### （一）不只有一套做研究的邏輯

經驗研究具有一套做研究邏輯：確定研究題目、文獻探討、方法設計、資料蒐集與分析、結果呈現。整體來說，雖然不是鐵律，但在研究實務中，特別是形式化後，這套邏輯經常於不自覺間被操作成線性的，並清楚對應經驗研究第一章到第五章的書寫方式，甚至影響到非經驗研究的研究邏輯。同時，對應這套邏輯，經驗研究發展出細緻講究的抽樣、問卷等方法技術，然後如前所述，研究方法教科書重點大致落於方法技術的設計，統計學則是在處理資料分析部分，也就是第三章與第四章。

暫且不論形式主義的問題，經驗研究邏輯具有方法論與認識論依據，並非無的放矢，只是做為主流方法，它遭受不少挑戰，而這裡想要重複一個提醒，即，在不少非經驗研究也受其影響的同時，研究是否就是依這套邏輯進行？理論上，即便簡化成質量區分來看，答案應該清楚：並非只有一種。

而且所謂的質化研究也有不同做研究的邏輯<sup>9</sup>，甚至 Denzin 與 Lincoln (1994) 提出修補匠 (bricoleur) 概念，主張在後現代等「後」(post-) 脈絡中，質化研究者是不拘一格地選擇或搭配不同理論、不同方法來進行研究，如此一來，研究變得十分彈性、多元與權變。不過為了做出簡潔清楚的比較說明，與質化研究經常一同出現的紮根理論 (Glaser & Strauss, 1967; Strauss & Corbin, 1998 / 吳芝儀 廖梅花譯, 2001) 可以做為簡化後的討論起點。

紮根理論開端往往是對於一個現象的興趣，或可視為對於一個有興趣「研究問題」的提問，只是也自此開始，研究不走線性邏輯。在利用紮根理論做研究的最初階段，「研究問題」不似經驗研究是事先就確定好，然後按部就班完成研究，紮根理論的「研究問題」也許更適合視為對於有興趣現象的初步觀察提問，是可以、也需要隨研究過程不斷重新聚焦調整，而這也是此處將「研究問題」括號的原因，兩者的定義不盡相同。隨後，紮根理論強調直接透過實際觀察、收集資料，於經驗資料的反覆比對分析、詮釋過程中，逐步歸納、發展出解釋研究問題的理論。也就是說，與經驗研究相反，紮根理論非常強調經驗資料的重要，研究需要透過經驗資料的不斷分析比對讓最終理論逐步浮現出來，而非只是利用經驗資料確認最初理論假設是否為真。不過這裡需要注意文獻在紮根理論研究中的位置或功能 (朱美娟, 2021)，有人認為倘若一開始就閱讀文獻會影響研究者主觀意識，進一步影響經驗資料分析與理論的浮現；有人則認為文獻於研究開端可以成為觀察、經驗資料分析時的先前知識，然而無論初步提問後接續的

<sup>9</sup> 先說明，這裡犯了一個化約風險。為了行文簡潔起見，我並未精準地使用經驗研究與量化研究。雖然兩者經常交互使用，也有高度重複之處，但理論上，兩者還是有所差別的。

相對於經驗研究，其他研究類型或典範有著不同方法論與認識論基礎 (可參考 Blaikie, 1993; Slife & Williams, 1996 等書)，理論上也對應著不同研究邏輯與方法，只是這些邏輯與方法很少被清楚交代。不過沒有清楚交代，並不妨礙做出好研究、成就重要作品，例如，應該很少人會去懷疑 Horkheimer 與 Adorno (1969 林宏濤譯, 2008) 的《啟蒙的辯證》、Goffman (1959) 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Foucault (1979) 的《規訓與懲罰》的經典位置。若是從最終作品回頭推論，我們應該可以合理推論三本書的作者有著屬於自己的研究邏輯。

在普遍進行質量劃分的當下，如果允許這裡大膽將非量化等同於質化研究，上述三項研究也像是在提醒所謂的質化是統稱，有著各自不同的流派。因此，質化研究的邏輯與方法應該是複數，而非單數。也就是說，好的「我的研究」應該也有屬於「我的研究」的研究邏輯，而不是不自覺地形式主義援用其他研究的邏輯與方法。

是文獻閱讀，或直接接續經驗資料收集，文獻都是必要的，扮演著促成理論逐漸浮現的功能。

順著紮根理論不難發現，研究同樣需要做出提問、需要文獻、需要進行經驗觀察，只是與經驗研究不同，這三項研究關鍵要素具有高度的交錯性。而在此基礎上，這裡延伸出另一種研究邏輯：研究是一種將暫時性理論持續精緻化成最終理論論述的過程<sup>10</sup>。在不同研究階段可能各有著重的前提下，文獻<sup>11</sup>與經驗資料將持續、交錯投入研究過程，一方面扮演效度或品質檢核機制，透過與當下階段暫時性理論的比對，檢核其合法性，或判斷哪些部分不合理，需要放棄，甚至整個另起爐灶。二方面具有精緻化功能，修正暫時性理論，使其展現更多構面與層次。也就是說，暫時性理論的建構是動態、階段性修正的，文獻與經驗資料則是修正的關鍵動力，當需要大幅修正或遭遇無法解釋之處時，則視狀況迴圈式地選擇閱讀新文獻，

---

<sup>10</sup> 需要說明，這是受紮根理論影響做出的延伸，與原版紮根理論有所不同。

我主張，相對於經驗研究，如果研究被視為對自己有興趣問題提出理論解釋的工作，那麼，研究應該是一種不斷精緻化理論論述的過程。研究者不需要迴避自己提出問題的主體位置，應該大膽、卻謹慎細緻地進行理論論述的建構。這不代表研究是自說自話，相反地，需要在有平衡與品質機制的狀況下進行，文獻、經驗資料便扮演這重要責任。

在研究提問之初，文獻便可能加入其中，一方面促成更多提問構面，另一方面，透過刺激想法、挑戰研究者自身錯誤與過度主觀認知，提出對於研究現象的最初解釋，即，最初階段的「暫時性理論」。這種「暫時性理論」是開放的，會隨著關鍵文獻閱讀做出重要修正而進入下一階段暫時性理論。或者，後續不斷收集來的經驗資料也有這種功能，而這些大量收集的經驗資料也將帶來被研究者觀點，同時進入理論建構過程中。

文獻與經驗資料是兩股刺激暫時性理論精緻化的力量，而且當經驗資料開始投入研究工作後將展開三種比對：資料與資料間的比對、資料與文獻的比對、資料與研究提問的比對。這三種比對一方面可以做為檢核不同階段暫時性理論的效度基礎，另一方面透過異例（Seale, 1999）或比較時發現的矛盾處，提出更細緻的解釋與更多的理論構面，並促成暫時性理論做出關鍵修正，進入下一版本。而經過數波暫時性理論的修正，最終完成最後精緻化的理論論述。

這樣的研究過程需要研究者對於自己提問、文獻與經驗資料的敏感度，敏感於進行上述三種比對時所出現的異例與差異，藉此思考如何修正暫時性理論，以做出合理解釋。遭遇無法解釋的差異或提出重大修正時，則進入新一波循環，透過重新尋找文獻，以及開啟下一波經驗資料收集，尋找合理解釋並鞏固新版暫時性理論的合法性。也因此，整個過程是數次迴圈、繁瑣的。最後得注意的是，如果最初暫時性理論與最終理論論述沒有太大差異，可能得小心整個研究是否有經驗研究化的傾向，就只是在確證理論而已，研究並未做到精緻化的功課。

<sup>11</sup> 我有意識地將「文獻」與「理論」區分開來。我主張在經驗研究中，理論與文獻經常交錯使用，是指既有（引用）的理論；用來支撐起整個研究的單一架構；推導出研究假設，再確認是否為真的東西。這種理論定義適用經驗研究，但會限縮文獻探討在研究過程中的功能，並造成與理論有關的形式主義。因此，我偏向使用「文獻」一詞，文獻是指整個研究過程中閱讀的材料，文獻尋找與閱讀是跨理論或領域的，而非限定於某個特定理論，其目的在於持續精緻化理論論述的功能。

或收集新一波經驗資料，再或者藉由兩者同時進行，將暫時性理論帶入下一階段，然後重覆此過程，直至最終理論論述得以浮現。

因此，無論是上述邏輯、紮根理論、其他類型研究邏輯，或 Denzin 與 Lincoln (1994) 提出的修補匠 (bricoleur) 邏輯，都意味著研究不是只有經驗研究、第一到第五章的邏輯結構。我們似乎得注意，一旦研究邏輯與這裡沒有細部討論的抽樣等執行策略開始形式主義化，被研究者存而不論，將會促成前述研究方法反客為主的情形。「我的研究」終究需要適合、有品質的「我的研究」邏輯，而非形式化地慣性使用某種邏輯範本。當然，這裡絕非想要傳達研究可以隨便做的意圖，隨便做，是不負責任的作為，研究邏輯與方法的關鍵在於反覆細工，以及最終產生的理論論述是否具有品質。

## (二) 不一樣的書寫方式

我們不難從經驗研究的書寫中看到一種用詞客觀、一到五章順序清楚，整體帶有單調科學味的書寫慣性。對經驗研究來說，這種書寫慣性有其方法論與認識論基礎，但就非經驗研究而言，似乎沒有跟隨的理由，模擬這種慣性經常是不自覺形式主義的徵兆，然後排除掉其他更適合的書寫方法，也排除了「我」在研究書寫中的位置。兩件事情或許可以讓我們更有信心在書寫時找到「我」，回到「我的研究」。

經驗資料的分析方式是第一件事情。基本上，量化與質化研究都需要分析取得的經驗資料，在強調客觀分析的立場上，量化研究依靠的是統計技術，然後將分析結果直接送入研究結論，完成最後論述的書寫。相對地，對幾乎不採用統計分析資料的質化研究，資料分析意味著研究者對於資料做出詮釋的必然性，但這不是指研究者可以隨意詮釋。例如在前述從紮根理論延伸出的研究邏輯中，文獻與經驗資料交錯投入的目的之一便是確保研究者詮釋手邊經驗資料時，得以參考是否獲得文獻與其他更多經驗資料的支持，也因此，異例很重要，它揭示詮釋發生錯誤的可能性。

這種每個階段都依靠文獻與經驗資料建構理論，而非確證理論的過程，指向最終理論論述是詮釋的結果，也因為是詮釋，在盡力維繫研究品質的

前提下，研究書寫不需要、也不應該刻意排除「我」的成分。也就是說，質化研究不需要刻意遷就客觀的形式主義，而是可以就著研究主題、立場，寫出「我」的詮釋，用最適合於自己研究邏輯、詮釋結果的方式書寫「我的研究」。例如從最簡單地，研究者可以不再避諱使用「我」，到可以跨越客觀文字，細膩情感地厚描某些重要構面、場景，或者再到採用陰性書寫、後現代書寫等基進方式。當然，再次提醒，這裡的關鍵在於如何透過文獻與經驗資料做為兩個支點，平衡與避免研究者隨意詮釋的情形。而這種寫出「我」的詮釋也對應著一種揭露自己論述立場的透明度企圖，讓讀者得以判斷研究的品質，以及該如何進行解讀。

第二件讓我們應該有信心回到「我的研究」書寫的事情是，事實上，不靠後現代反線性、反客觀這些基進觀念做為支撐，我們閱讀例如 Goffman (1959) 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Foucault (1979) 的《規訓與懲罰》、Bauman (2000) 的《液態現代性》，不難發現這些著名研究展現著各自書寫樣態。雖然它們是書籍，不同於當下主流的期刊論文，但應該也足以說明跨越研究慣性進行書寫，而且具有個人風格的可能性。或者，這些書寫似乎提醒我們留意，經驗研究的寫作慣性雖然是主流，卻可能是學術場域管理主義與形式主義盛行的結果，以致研究者不敢做「我的研究」，不敢書寫「我的研究」。

回到作家的比喻，如果我們接受 Kafka (1925/李魁賢譯，1993)《審判》是在描述科層體制困境這種說法，Kafka 與 Weber 兩人便像是於二十世紀初期同樣敏銳觀察到科層組織的出現與困境，然後用不同方式描述他們觀察到的現象。或者，Bauman (2004) 在書寫液態現代性與廢棄特徵時引述 Calvino (1972/王志弘譯，2023)《看不見的城市》中一座想像的城市 Leonia，兩者的對照也像是在說明我們可以用不同文類再現相同的現象：追求新東西、不斷拋棄、沒有負擔。當然，這裡並非主張作家與研究者沒有不同，但倘若研究者與作家都在觀察社會現象，都在書寫自己對於社會現象的觀察，甚至將自己視為知識分子都在批判社會，這裡似乎便得認真回應一種大膽的後現代可能性：不存在客觀、準確反映社會現象的再現，學術書寫只是各種再現之一；學術理論僅是各種敘事之一，並不具有特殊

權威位置。也就是說，在後現代關照下，學術書寫並不因為其宣稱的客觀、效度、科學而具有特殊權威與優越性，主流的經驗研究書寫更就只是各種再現形式之一而已。因此，至少就書寫層次來說，Bauman 可以選擇更為文學式的書寫，Kafka 可以是社會學家。

主流研究訓練經常讓我們掉入無我脈絡，不少研究者學習書寫論文時應該都有一種經驗：設法排除形容詞、排除主觀、排除書寫中使用「我」這個字。或者成熟研究者也可能於書寫時會有著設法壓抑「我」的經驗。如果是基於方法論與認識論理由做出這種排除或許有其合法性，但既然非經驗研究需要詮釋，那麼為什麼一定要壓抑「我」的存在，不自覺地形式主義起來？這裡並非要學術場域進入後現代狀況，卻也的確想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或許可以折衷地去問，為什麼往往就是用那種方式書寫？可不可以就「我的研究」找到最適合的書寫方式？在不是放任隨便寫，同樣講究論述品質考量下，研究應該可以有著不同的書寫方式。

#### **肆、一種可能的說法：藝匠與作品精神**

結構綁著行動者似乎是宿命。在資本主義普遍殖民各個場域的台灣社會，學術場域的結構改變帶來一種學術勞工化、形式主義的困境。不能否認，結構力量可能令人窒息，加上革命不太可能發生，使得學術場域中的行動者像是進入進退失據狀態，順著結構主流，比較安全。

生存是重要的，因此順著結構主流是需要尊重的選擇，只是如果我們期待的比生存多一點，期待學術工作具有自由、多元、創新、批判本質，或許我們就得多想一些，也許不必稱之為對抗，但需要想辦法回應結構宿命。

前面提出關於研究提問、研究邏輯與研究書寫的後設思考，可以視做對於回應結構宿命的一種看法：研究者可以用不一樣的方式做研究，做「我的研究」。不過「我的研究」又分別向前與向後對應著兩個更為根本、更難回答的問題：我們該如何看待研究者的角色？以及研究工作成果對研究者可以有什麼意義？兩個問題影響研究工作者該選擇什麼樣的工作方式。而在主張學術工作具有自由、批判本質的前提下，配合作家比喻，這裡提出

藝匠與作品的回答，這個結尾顯得簡單，卻是我的看法。更重要地，該如何回答前述兩個問題還是取決於個人選擇，但做出後設思考，是掙脫結構的開始。

做為學術場域的行動者，研究者的定義可以是複數的，除了單純是做研究的人，也可能加上文人、公共知識份子、專業研究人員等身分。然而如果我們聚焦且認同 Marx 論述生產線上的異化狀態：勞工就是反覆生產，與自己產品失去情感連結，那麼，相對於勞工，藝匠是討論研究者角色的一種方式。作家應該是藝匠，研究者應該也是，一群有藝匠精神的人。

簡單來說，「我的研究」的「我」應該是藝匠，研究則是「我」的作品。Kafka 是有藝匠精神的作家，他創作的是「我的作品」，作品之於作家，是有情感的，是出於細工、反覆修正的，而非只是生產線上的業績。在管理主義與形式主義盛行的學術場域，研究者也應該有藝匠精神，願意花時間觀察，做出「我的提問」，然後願意反覆細工打磨最終成就「我的作品」。也就是說，除了做出「我的作品」這個關鍵，藝匠精神另一個層面在於反覆細工。因此，「看自己文章不順眼」、「總是想去改他」是好事，是藝匠精神的徵兆，代表著研究者與自己作品之間的連結，因為是「我的作品」，所以有著情感連結，不像生產線上的產品，就是照標準完成的產品，與自己無關。

不過，反覆細工是藝匠而非勞工的美德，在強調績效點數的學術場域並不容易達成，研究者需要有勇氣違背主流，而這也將問題延伸到研究者做為知識分子這個傳統討論中。在生存前提下，鼓吹別人要勇氣與意志，有著推人入火坑的道德問題。然而無論是願意反覆細工修改，或是願意違反形式主義，又或者願意負起批判社會的責任，似乎都意指 Said (1994/單德興譯, 1997) 論述知識分子時的邊緣精神。如果我們不想勞工化，相信學術工作的自由、批判本質，一種願意與主流結構抗爭，至少願意做出某些回應的意志是必須的。否則研究者很容易被形式主義、管理主義收編。多些勇氣與意志的研究者應該敢於堅持做「我的研究」、敢於因為細工而花更多時間成就作品、敢於與評審對話。我們或許不需與主流作對，但可以多一些邊緣精神。

在嚴峻結構中逐漸失去勇氣與意志是人性，不過帶著它們也許更能夠找到自己在學術場域中的可能性。有時想想，帶著看不太懂、囃語式、哲學式的風格正是 Baudrillard 之所以為 Baudrillard 的原因。

當然，更希望結構可以留下更多空間給藝匠式研究者去細工，去做「我的研究」。在實務與理想間，以上是我的說法，不一定對，但這些問題的後設思考是開端。只希望不要像是卡夫卡審判中 K 的運命，想弄清楚自己的罪，卻始終不可得。

## 參考文獻

- 王志弘等譯（2000）。《東方主義》。台北：立緒。（原書 Said, E. W.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 王志弘譯（2023）。《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原書 Calvino, I. [1972]. *Le città invisibili*. Torino : Einaudi.）
- 朱美娟（2021）。〈紮根理論研究方法：不同陣營之間的比較與選擇〉，《市北教育學刊》，68，1-22。
- 吳芝儀、廖梅花譯（2001）。《質性研究入門：紮根理論研究方法》。嘉義市：濤石文化。（原書 Strauss, A. &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London: Sage.）
- 李沅沅譯（2019）。《學術人》。台北：時報。（原書 Bourdieu, P. [1984]. *Homo academicus*. Paris: Minuit.）
- 李魁賢譯（1993）。《審判》。台北：桂冠。（原書 Kafka, F. [1925]. *Der Prozess*. Berlin: Schmiede.）
- 周昌忠譯（1996）。《反對方法》。台北：時報。（原書 Feyerabend, P. [1975]. *Against method*. Atlantic Highlands : Fumanities.）
- 林宏濤譯（2008）。《啟蒙的辯證：哲學的片簡》。台北：商周。（原書 Horkheimer, M & Adorno, T. W. [1969].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Frankfurt: Nachdruck als Taschenbuch.）
- 林宗弘（2015）。〈學術資本主義崛起〉，戴伯芬、林宗弘等著《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頁 2-33。台北：群學。
- 夏曉鵬（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北：唐山。
- 張君玖、劉鈞佑譯（1996）。《社會學的想像》。台北：巨流。（原書 Mill,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單德興譯 (1997)。《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原著 Said, E. W. [1994].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黃春明 (1974)。《莎啞娜啦 再見》。台北：遠景。
- 戴伯芬 (2021)。《學術這條路》。台北：大家出版。
- 鍾蔚文 (2002)。〈誰怕眾聲喧嘩：兼論訓練無能症〉，《中華傳播學刊》，1，27-40。
-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 Bauman, Z. (2004).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 Cambridge: Polity.
- Blaikie, N. (1993). *Approaches to social enquiry*. Cambridge: Polity.
-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1994). Introduction: Entering the fiel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18).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2023).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 Sherida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Glaser, B., & Strauss, A.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 Habermas, J.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J. Shapiro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 Seale, C. (1999). *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 Slife, B. D., & Williams, R. N. (1996). *What's behind the research? Discovering hidden assumption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Thousand Oaks: Sage.

## Some observations about academic research

Wen-Chiang Chang

---

### Abstract

As Taiwan's academia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apitalized, managerialism and formalism, two key forces, have interactively affected researchers and the conduct of research. This essay argues: if we consider that academic research must retain freedom, diversity and critical essence, meta-thinking about somethings of research works is crucial. Although such thinking cannot make structural changes, they at least symbolize a free will liberated from the existing struct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idea, "MY STUDY", to prevent the formalization of research works.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their results could be seen as that between craftsmen and their works. If craftsmen could have artisan spirit and finely create their works, then researchers' alienation from their results could also be prevented.

keywords: methodology, formalism, managerialism, academic capitalism, craftsman